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文化视野

文化深度决定书法高度

□ 王岳川

在中国文化史上，书法的地位非常高。艺术家不仅将琴棋书画看作把握人生的艺术技能，更是把这些看作有限生命诗意生存中的高妙境界。但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书画和西方世界艺术趣味的冲突日益加大，东方境界正在被不断贬抑和自我轻视，与西方流行文化相比被人视为无足轻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书画变成了专家书家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一种艰辛努力，也成了诸多退休老人安度晚年的余光。这两个极端使得书法艺术的大部分文化精神失传和落空，书画文化遭遇到了加速失落的命运。

现在，一些人过分强调书法技法、结构、形式、视觉冲击力，深究起来，无疑受到百年前形式主义思潮的影响。二十一世纪最新西方理论是“生态美学”“生态文化”，倡导重新回归家园，对反文化反自然状态加以批判，重新确立优美典雅的美学风范。中国书法的“先锋”跟随百年前的西方而大谈形式主义，事实上早就成了过时的“后卫”。这真是令人感到恍若隔世的悲哀。

书法的止于至善

古代文人从不为写书法而写书法，他们在书法中寄托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和高尚气概。如苏东坡《寒食帖》：“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写如此惨痛的诗，东坡却写得潇洒神俊，如果今日书家就会变成一种爆裂情绪的喷发和一片狼藉的书法痕迹。这幅字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三行书”，代表了东坡“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中国文人的高风亮节，一种重压之下绝不低头的强悍的精神力量。

书法家最难的不在于技巧，而在“不自知”和“止于至善”。有的书法家得到传统一点笔墨，就狂妄地认为自己超越了王羲之，超越了孙过庭，这种超越应缓行。在西方对古希腊、莎士比亚、歌德从来不敢狂妄用“超越”一词，季羡林先生说，“真正的经典是不可超越的”，只能做到有限的努力在某方面有自我的个性区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池水尽墨”的张芝，“池水尽黑”的王羲之，“技近乎道”的中国历代书法家，他们所努力臻达的境界就是精益求精、止于至善。至善不仅是技法，因为比技法更高的是道，如果书法离道，书法就浅了。孙过庭对那些歪门邪道的各种奇怪之书深恶痛绝，他反对写字如绘画：“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而对一些书艺不高，仅凭附权贵名人抬高身价的书家提出尖锐的批评——“身谢道衰”，人死后其书法价值就衰退不堪，实在是警策之论。

书法的四个维度

书法有四个维度，在今人心中已经模糊，所以要重新提出。

第一，书法之“书”应回到《六书》本意，书就是文字。如果下个定义的话：书法是“文字表达深度文化内涵的典雅书写”。包括三方面：首先，一定要写文字，在篆隶行楷草中笔歌墨舞；其次，它必须包含深度的意义内涵——经、史、子、集名句和自己情感迸发的上乘诗文；再次，它必须典雅地书写，比如写得很烂，写得很怪，写得八病从生，气象很弱，就不能叫书法，只能叫作写字习作，甚至是很劣质的习作。如果某位书家不写文字就最好叫作抽象画。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千变万化，穷尽汉字的变化之功能，但必须写的是文字才能叫书法。

书法被誉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有的。书法将汉字的艺术美发挥到了极致，篆书、隶书、行书、楷书、草书等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在古代，但凡能读书认字，都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可以说书法是中国最具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一端连着汉字魔方，一端连着经史子集。书法之“书”字就是文字，书法是文字的审美书写，文字背后有着伟大的意义。如今，汉字文化圈名存实亡，如果今天不重视汉字，不重新修复汉字文化，不重新再提倡中国汉字文化圈，我辈将愧对历史。

第二，书法不仅不可没有内容，而且必须是含义深蕴的内容。正是书法，将已经中断的古代经、史、子、集重新引进当代人的生活空间。今天在很多地方已经看不到古文，专门保存古代汉语中文化正能量的就是书法：“立己达人”“极高明而道中庸”“心远地自偏”“厚德载物”“道不远人”等，都使已经中断千年的历史，重新走进今天的生活。文字尤其是书法书写的文字保存了历代的经典。古汉语被现代汉语白话文所替代，但是书法家写的书法中却保存了先秦诸子、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及名言警句的精神气脉。无视这一文化内涵的重要意义，只重视形式主义的以偏概全，将对书法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应注意书法公共空间的问题。古人书法作“案上观”，今天书法作“壁上观”，确实，视觉发生了变化，但是要看到更大的变化，那就是公共空间。今天人文社会公共空间中书法没有太高的地位，书家题字基本上都是店铺名字，很多地方都是采用美术字，甚至用的电脑字。其实，书法的空间很大，公共空间很宽阔，书法的本体是“书写性”，它是中国人在这个机械数字世界中徒手书写的艺术。书法八面出锋，阴阳向背，点化之间，血性毕现，才情勃发，神骏之极。书法成为一个文化人最逼真的心电图，像怀素一样“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完全是敞开心扉，舒散怀抱。我们应该珍惜在这直线条的现代世界中独存的徒手线条的艺术。同时，在电脑网络时代，需要恢复中国书法的公共空间，使书法不仅在画廊、拍卖机构、书画市场、民间交易中出现，而且应该在中国大中小学课堂中出现，在百姓们日常生活中出现。书法是“技近乎道”的——书写的内容是中国接近断根的中国经史子集的文化内核；张挂的地方是亭台楼阁、佛庙道观，大门中堂、酒肆文轩等。普及程度为国人之最，老中青幼皆宜。随着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书法一定会在东方文化的世界化中大展身手。

第四，中国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形象中，书法形象的文化软实力不可低估。笔者在参加西湖申遗时，一个外国主评委说：“西湖这样狭小不洁的湖凭什么要申遗，北欧这样的湖有两千多个。”我说：“您错了，西湖不是你们北欧的自然湖，它是中国南宋以后的文人湖、文化湖、书画湖、诗词湖。”西湖去年申遗成功，就在于外国人真正明白了，原来亭台楼阁那些对联，那些诗词曲赋，那些文人，白居易、苏东坡们构成了西湖之魂。中国的亭台楼阁是书法文化拓展的巨大文化符码，设想一下，如果黄鹤楼没有对联没有牌匾，岳阳楼没有书法匾额，昆明湖没有长联，它们最后还剩下些什么？可以说，中国书法发展的最大空间当是整个世界，这要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去看。现在海外的孔子学院培养出了六千多万能够写汉字，读汉语的人，但是不会写书法，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书法的“正大气象”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界受美国嬉皮士文化和政治波普艺术影响，有一股不小的审丑之风在艺术界颇为流行。比如书法西化主义，把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连根斩断之后，把这根藤接在西方现代艺术上。在“西式书法”的展厅里，很多参观者都很困惑，因为不知道书法西化主义要让人看什么。不妨说，书法西化主义在中国，它可以探索，但却是一条书法歧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今天的出路不在于将自己嫁接在西方现代艺术这“西方的丑学”上，而是让全世界的人学会领略东方书法的韵味和精神深度，起码在多元时代学会尊重中国书法文化，学会尊重和欣赏这种差异性文化形态。中国书法应该拥有这种自我意识和自信。

书法应坚持“正大气象”。要做到书法脉络“正”而又不死板、不僵化是很不容易的。做到“大”，“大”不是字要写的大，而是气象要大，内涵要大，这和一个人的人格、精神有很重要的联系。有人摆布的痕迹和匠气很明显，但“正大”实际上也说明了内心高远宽博的展示，自然而然的流露，不是刻意出来的。“气”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象”是大国崛起的精神形象。有大气象的作品会给人一种鼓舞、一种感动、一种震撼。书法家也罢，书法爱好者也罢，走上正大气象道路时也陶养着自己的人格襟抱，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书法就成为自我浩然之气的真实流露。可以说，“正大气象”是书法家的光明大道，也是大国崛起中国家形象的世界展示。



史 镜

晚清政府的几步错棋

□ 高中华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忧外患，民族矛盾越加严重，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国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客观形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治体制竟一波三折，引发一系列错误，更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紧张，多重矛盾交织，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处置不当，咸丰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最后死在北京故宫之外。在继承人问题上，咸丰帝的遗嘱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隐患。他一方面考虑到皇后无子，贵妃幼子继承大统，将会出现皇后与母后专政间的矛盾，他设想出一个八大臣赞襄、两宫皇太后各执一印（皇后用“御赏”印、那拉氏代载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体制，以求达到互相牵制的效果，这是咸丰帝死前的精心安排。谁曾想到，他将六弟奕䜣排除在体制之外，使之不能参与朝政，这就开启了政局不稳的先兆。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赞襄王大臣深知身为皇子生母的西宫那拉氏潜在的政治危险，就采取了“抑西扬东”的策略，从礼仪封号上先后为东宫、西宫封号，以示嫡、庶之别，通过对西宫的贬抑，以图分化两宫皇太后。迫于情势，西宫慈禧太后不仅主动拉拢东宫慈安太后，还联合此时在京师与英法联军谈和的恭亲王奕䜣，内外联手，最后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不仅使双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续。同治初年，奕䜣以议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实握相权。慈禧太后实握帝权，把持朝政，出现了帝、相、后并存的政体，这种以太后之尊听政的慈禧慈安两太后、年少软弱的载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䜣等王大臣之间构建的三角政治格局，既有临时稳定的因素，从长远看又使清廷最高层具有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慈禧和奕䜣之间在达成某种默契的同时，也潜伏着一种难以消除的权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䜣不守礼仪之名，取消议政王名号，收回了相权。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宫“垂帘”，独揽朝政。为进一步去除绊脚石，在1884年中法战争酣战之际，慈禧太后以奕䜣用人不力为名将其逐出军机处，重新改组军机处。没有了任何制约和牵制的慈禧太后更加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内政外交更加腐败。

1889年，光绪帝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成了外国人眼中的“国家元首”，但名不符实，实际权力仍然掌控在慈禧太后手中，这样就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且矛盾重重。慈禧太后恼于光绪帝借维新之名行夺权之实，欲将其废弑，并根除维新派。后来，更传言西方列强欲迎光绪帝归政，慈禧太后才想假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报复西方列强。最后落了个自身西逃西安、京师浩劫、国家蒙羞的结局。

慈禧太后病死前，遗命溥仪之父载沣摄政监国，光绪帝的遗孀隆裕为太后。这一格局与咸丰帝死前的“赞襄与太后”的格局何其相似。载沣竭力巩固摄政体制，更加剧了政治体制的矛盾。载沣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拿北洋大臣袁世凯开刀，加上猜忌日久，急欲除之而后快。张之洞力劝恐激生他变，载沣犹豫寡断。隆裕太后命袁世凯回老家去养“足疾”，怎会想到几年之后就是他逼孤儿寡母退位呢？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集团权倾东南，坐拥半壁，开始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但仍能维持满汉统治阶层长期合作的统治格局。而到了载沣摄政时期，满族权贵集权于内，排斥汉族官僚于外，至此，满汉统治阶层的矛盾激化，汉族地主官僚出现了离心倾向，满汉合作局面出现重大裂痕，且难以缝合。针对于此，汉族官僚为自身利益开始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加之载沣集团的腐败，满族亲贵四面楚歌。

咸丰帝为求皇权平衡，搞出来一个赞襄大臣与皇太后共同辅佐幼帝的政治体制，实为求互相牵制，但最后以祺祥政变完局。出现了一个帝、相、后并存的体制。慈禧太后从借助相权、利用后权，到最后形成一人专制。看似权力稳固，实则使内政外交更加腐败。与皇权体制相呼应的就是中央集权问题。咸丰帝为扶大厦于将倾，始起用汉族官僚集团；慈禧太后杀肃顺等八大臣，但杀其人而不废其策，终于躲过太平革命一劫。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满族亲贵在把控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并且输得血本无归，最后袁世凯竟成了一时的最大赢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父亲载沣时写道：可以看出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没有杀袁世凯，只能是个战术问题，而清王朝是输在了战略上，他们犯的是战略错误。

有所思

近代日本是海权大国吗

□ 顾 全

日本重视海权的地理因素

一般来看，岛屿或群岛国家似乎“天生”容易以“海权”立国。因为有限的国土和四面环海的环境使其更倾向于发展海上贸易及从事殖民活动，并依靠强大的舰队保护本土和海上交通线。对此，历史上曾以不列颠群岛“起家”的大英帝国似乎是最好的证明。但也有不少人把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看作是依托“海权”而兴盛的案例。从表面上看，它确实也是一个岛国，而且还拥有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后者凭借击败中、俄两国海军曾长期称霸东亚海域，并于1941年末以远程“偷袭珍珠港”的戏剧性方式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

事虽如此，但若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整体国策和发展历程稍加详察就可发现，日本虽可被称作“海军强国”，但却难以被视为“海权大国”或“海洋大国”。这是因为岛国地理的“天资”和卓越的舰队“战力”只是发展海权或成就海权强国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与英国不同的海权思路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学上的划分，而非纯粹的地理概念。在经济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地缘政治的基础是地缘或地理，但落脚点终究还是在政治，即国家权力的运用及国策的性质。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经济技术背景下，国家如何在地理格局的限制中使用国力、选择更富成效的发展模式。所以，这绝不意味着地理决定论，因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决策者依然有选择的空间。

英国走上海权道路，即摒弃大陆领土野心、专注发展海军以为海外贸易保驾护航，并非天生注定，而主要是英法百年战争后，它在欧洲大陆的前哨和领地尽皆丧失所致。另外，欧陆长期的政治分裂和群雄逐鹿也为英国发展纯粹的“海权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环境。由于大陆列强忙于内斗而无暇他顾，英国历代政府以一支小规模精干陆军为依托就可确保本土防卫无虞，同时凭借遍及全球的海军舰队来保护商业航道和海外领地。另外，领衔工业革命的潮流也让英国仅凭商品就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世界，通过贸易和投资从各地汲取源源不断的财富。因此，对英国来说，先进的生产力、商贸投资、海军舰队是其“海权立国”的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而以暴力争夺领土对其来说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显得“不划算”，因为那意味着行政成本、战略负担以及建设“大陆军”的无尽成本。

但日本与此不同。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统治精英围绕“陆主海从”还是“海主陆从”、“北进”（大陆）还是“南进”（海洋）曾有过多次激辩，出现过朝向大陆的“征韩论”和朝向海洋的“岛屿帝国论”。但自甲午战争取得朝鲜利权后，日本的国家精力就渐被“大陆政策”和“北进”所主导。日俄战争后，该政策进一步覆盖了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确保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进行“满洲经营”，自此成了日本历届内阁难以弃绝的国策。为了实现这一国策目标，日本甚至不惜制造九一八事变，并以保卫满洲的名义进一步出兵中国华北，从而引发全面侵华战争。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岛国最终却选择了“陆向”的发展道路。

选择“大陆政策”的原因

这种“大陆痴迷症”起先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维新之初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处于外患频生的险境，而当时俄国沿西伯利亚向远东太平洋的扩张被认为是日本的最大威胁。而除了巩固本土防御、训练新式海军保卫海岸外，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维新元老”判断，虚弱的朝鲜将成为以俄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企图染指、侵扰日本的跳板。从地理上看，从东亚大陆突出的朝鲜半岛也确如一把刺向日本的尖刀。因此，将朝鲜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或至少确保朝鲜独立而不被他国控制，成了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发端的思想源头。

当然，从战略上说，相较于向西方列强利益集中的中国华中、华南和东南亚等地扩张，向满洲方向扩张相对较易，因为这一方向的竞争者除了俄国再无他者。而中国的虚弱、内乱和中央政府的无力更为日本的大陆野心提供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并且，确保前次“战果”的安全也成了下轮扩张的借口。大陆政策由此获得了一种不断外扩、近乎自我生长的逻辑。

但在先后战胜中俄两个大国、战略安全需求暂时不再紧迫时，经济考虑也成了大陆政策的新理由。具体说，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广阔空间能为日本的工业发展和过剩人口提供原料、市场、投资和殖民场所。虽然类似“满洲”、台湾、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对日本的实际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大助益在学术界仍存争议，但这种经济学说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学理可靠性，而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化”，即成了一种类似教条的观念。经过包括陆军和某些企业在内的利益团体的宣传，“满洲被塑造成了日本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而在一战结束后，随着军事上“总体战”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把中国整体资源纳入日本控制又成了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从事工业化战备、企图对抗美苏这类洲际大国的绝对需要。就这样，日本的胃口不再局限于“满洲”，而进一步囊括了中国内地以及东南亚，最后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需要注意的是，日本这种对大陆资源和市场的经济需要与英国有质的不同。由于属于后发工业国，日本没有英国那样的先进工业技术、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庞大产能，因此在开放市场上与西方先进工业国自由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日本更热衷于构建“封闭”“排他”的经济圈。而封闭和排他就难免以武力为后盾，由此，侵略和占领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鲜明特征，并让日本后来与宣扬“门户开放”的英美列强发生了尖锐矛盾，为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最后，20世纪30年代日本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也有利于大陆政策的升级。当时日本陆军纪律渐趋松弛，部分中下层军官和驻外部队军官对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有时拒不服从，并出现了一系列密谋、暗杀和政变企图。在这种环境下，部分出于个人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一些在华日本军人不断在大陆挑起事端，引起中日军事冲突，并逼迫东京追认“事变”的既成事实，从而把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引向全面侵华的泥潭。这也是后来日本大陆政策不断扩大并最终失控的重要原因。

受“大陆政策”影响的日本海军

日本强势的“大陆政策”和经营“陆权”的野心也影响到了日本的海军建设。为了与陆军争夺预算、证明自身价值，日本海军虽然口头上不断宣扬“南洋”（即中国华南和东南亚）以及“南进”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不得不默认“大陆政策占优”的既成事实和必要性。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南进”才因美国对日经济制裁的困境和对华战争的需要——切断国际对华援助通道——而真正提上日程。同时，日本海军的假想敌也往往是最有可能与日本争夺大陆势力范围的国家：起初是中国（因争夺朝鲜），后来是俄国（因争夺“满洲”），最后是美国（涉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安排）。由于“海洋经营”不是重点，而且“中国市场”也近在咫尺，所以日本也就没有那么多远洋领地和利益需要保护。结果，与强调履行多种职能（包括和平时期保障通商贸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的英国海军不同，日本海军以战斗（即“舰队决战”）为唯一要务，而作战目的是歼灭敌国来犯舰队，夺取东亚海域制海权，以阻止别国干扰日本陆军在大陆上拓展霸权的侵略。而这也是旧日本海军在“舰队决战”以外的其他领域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保交护航、反潜、后勤补给等等。肇因于此，旧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总之，日本海军虽然战力不俗，但其发展是深受“陆权”政策影响的。

综上所述，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二战结束前的近代日本更应被定位为一个“陆权大国”或者“海陆兼备”的大国，而绝非纯粹意义上的海权国家。而它以岛国身份不断孕育、膨胀的大陆野心，最终也诱使其逐渐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歧途。